

# 从严治党必须防止“儒化”倾向<sup>\*</sup>

## ——基于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比较及启示

庞 虎 刘 珍

**提要:**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客观上相似的传入渠道和相同的衍生背景,并且共同促成了“中国”意识的高扬。但在“中国”国情的解读视角上,却存在着儒学本位与现实本位的实质差异,并进而在“知”与“行”、政党与民族、化大众与大众化、旧秩序与新中国等一系列运作层面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路径分歧,三民主义儒学化暴露出明显的伦理色彩、狭隘视野、精英观念、偏安倾向,最终难脱失败的结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立足革命实践,着眼民族大业,深植民众根基,在不断推进中国变革中找到了现实的发展路径。新时期,只有超越儒学化的纠葛,坚守现实实践的客观本位,才能不断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新飞跃。

**关键词:** 三民主义儒学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实路径

**作者**庞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732) 刘珍,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厦门 361005)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6.01.002

近年来,“儒化共产党”思潮迅速升温,已给党的意识形态认知和践行产生了很大影响。究竟应以何种视角解读中国国情?以何种路径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共两党的历史比较,有望能够初见端倪。

### 一、外力影响下“中国”意识的激扬

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有识之士在中西力量的对比中,察觉到西方文明的巨大优势,兴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在西学热潮的喧嚣声中传入中国。孙中山认为,欧美强盛的主要原因就是“三大主义”指导:“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主义使西方国家“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所以,中国人应该学习引介,“使最宜之治法

<sup>\*</sup>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2072015123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儒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适应于吾群”。<sup>①</sup> 1905年,同盟会成立,三民主义也作为该会的指导思想正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此时,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零星传入,但是它或者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说的附带成分、或者被视为“不切于中国之主义”,<sup>②</sup>还没有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

“一战”的爆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重大影响。一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由原来的“未来学说”变成了具有现实样板的救国真理,给中国人民的救国探索增添了新的选项,还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二是,欧美社会掀起了一股抑“西”扬“东”的反思风潮,并迅速传入中国。“一战”的惨烈以及战后的困苦,打破了西方人原有的自信,开始“对理性力量解决人类社会问题失去了信心,对个人自由的自由原则失去了信心,对议会民主制度失去了信心”,<sup>③</sup>进而产生了对东方文化的热切赞赏,“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方文化因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sup>④</sup>这一思潮通过留学生回国叙述或者来华西人讲学等方式传入国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冲击。胡适在1926年的《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写道:“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精神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是一时病态的心理,却正迎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气焰。”<sup>⑤</sup>

面对这一变化,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阵营产生了既貌似、又神离的复杂反应。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国、共两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关注程度明显提升,共产党人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也把社会主义当成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并在大革命时期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与此同时,两大政党也都对西方文明的弊病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都表达了反对盲目西化、重视中国国情的原则立场:“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大害的……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sup>⑥</sup>“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sup>⑦</sup>

但是,如果回到实质层面,就会发现,双方的上述转变还存在根本差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共产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第三文明”即“俄罗斯文明”,它“兼欧亚之特质”,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是全人类共享“普遍真理”,当然可以运用于中国。<sup>⑧</sup>而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则用中国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两千余年以前,中国经书就早说过”<sup>⑨</sup>之类的结论。这一论断,一方面说明了国民党人对新主义的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事物既不适应又不得不面对的复杂心理,只能选择转向旧文化去找寻合理化依据,表现出明显的传统取向。该取向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战”后,虽然国共两党的“中国”意识都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的表征有哪些?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孙中山看来,只有传统文化才能代表“中国”,因为在今日中国只有传统文化能够与外国文明“并驾齐驱”,因此“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驾于世界”,此时,他甚至把原本由欧美传入的三民主义重新解

① 《发刊词》,《民报》1905年10月20日。  
 ② 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第2号,1903年2月27日。  
 ③ [美]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70页。  
 ④ 《泰戈尔来华感想录》,《申报》1924年4月14日。  
 ⑤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06页。  
 ⑥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4页。  
 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⑧ 《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5页。  
 ⑨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年,第1509页。

释成三大来源即：“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sup>①</sup>并把传统文化来源放在了首要位置，“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甚于程伊川之说”。<sup>②</sup>其中的传统倾向已显而易见。如果说，在孙中山这里，传统还仅被看成来源之一的话，那么，到了蒋介石时期，三民主义就完全成了儒学传统的化身。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中国道德文化“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子，以后断绝了一段，总理即是要继承这个道统的”。<sup>③</sup>戴季陶也鼓吹：“先生之思想体系，不自西来，而发自中国固有之文化”，<sup>④</sup>“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sup>⑤</sup>在各地举办的祭孔大典中，诸如“孔子之学说与总理主义之关系，可谓前后辉映”之类的言论，也屡见不鲜。这样一来，孙中山变成了儒家道统的继承人，三民主义也被儒学化解读后，没有了本来的面目。从历史考察来看，共产党人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言论，例如：1916年，陈独秀曾认为“儒家要求平均分配财产和限制土地所有制，即是社会主义的先例”；<sup>⑥</sup>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也曾呼吁文化界要做“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sup>⑦</sup>等等。但这些言论并未成为思想的主流，并且很快就被本人的后续言论所修正，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更没有深入到实践操作的层面，所以只能算作“中国化”认识过程中的个别误读。共产党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都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有的还是该运动的领军人物，已很难产生对孔学的顶礼膜拜。陈独秀认为，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对实际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应该“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sup>⑧</sup>李大钊则更明确地提出了“国情”理论，认为：国情必须是本国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国情不能拘泥于历史，“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sup>⑨</sup>国情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还提出了“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的口号。<sup>⑩</sup>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和现实国情的结合，才最终超越了儒学的纠葛，走上了真正中国化的征程。

## 二、儒学化与中国化：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分歧

“中国”认识上的差异，必然带来运作层面的分歧。具体来说，二者的路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知”与“行”

最初，外来的主义都是作为一种救国真理而传入中国的，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必然要面临知与行之间的衔接与转化问题。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就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的论断，形成了“行”比“知”更重要的朴素知行观。经过之后历代儒者的改造与阐释，到宋明时期，知行观出现了过分强调心性良知的倾向；王阳明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唯心思维出发，提出了“知之真

①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532页。

③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2页。

④ 戴季陶：《敬题中山先生手书建国大纲》，《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至六月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1983年版第790页。

⑤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7年，第65页。

⑥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⑦ 陈伯达：《在文化战线上——〈真理的追求〉续集》，生活书店，1939年，第90页。

⑧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⑨ 《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3页。

⑩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6、35页。

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的知行理论。蒋介石自称“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sup>①</sup>把道德心性修养看成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sup>②</sup>“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所以,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必须“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sup>③</sup> 1930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被蒋介石明确定位成“一个以德性复活的,来求民族复兴的活动,他的主要目的在革心,我们古来立国的基础在道德教条方面说,是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但表现在行的方面,则以忠孝仁爱为中心”。<sup>④</sup> 这样一来,三民主义被打上了明显的伦理色彩,该主义的运行,就主要取决于“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的内圣功夫了。

对此,刘少奇指出,抽象的善良之心是不可能改变现实的,“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修养是必需的,但必须是“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sup>⑤</sup> 陈独秀、李大钊也在经历“五四”泛道德主义的理论尝试之后,重新找回了唯物主义立场,提出了“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sup>⑥</sup>“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等论断。<sup>⑦</sup> 在此基础上,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提出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等辩证唯物主义知行观,得出了认识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科学结论。<sup>⑧</sup> 这既是对儒学长期以来知行之辩的创新解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科学概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长期斗争实践的磨砺中,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断检验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二)政党关怀与民族视野

近代,伴随政党政治的兴起,政党已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标识,主义与政党的关系也就成为影响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就三民主义本身结构来看,它既是“一个”主义,又实际上是“三个”主义的体系状况,虽然迎合了当时“主义”繁多、莫衷一是的政坛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党内多元信仰、分裂离析的变数危险。最初,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主要依托孙中山的个人权威来推动:几乎所有的声明、指示都出自孙中山一人之手,甚至1923年之前的十余年里从未开过党员大会,党的主义也基本由孙中山一人解读。孙中山去世后,为应对意识形态危机,蒋介石等人搬出了孔夫子,力图借助孔学在古代中国的道统地位,来排斥异己,树起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在中国的独尊权威。但是,儒教的重新确立以及祭孔、读经等系列活动的高调推行,实际上已把儒学抬到了政治信仰的高度,无形中更加剧了主义信仰的混乱,“把三民主义弄得扑朔迷离”,致使一些党员“抛弃了三民主义去别求途径”,<sup>⑨</sup>导致民国时期另行组党的热潮达到了风靡的程度。建党之初,孙中山就已指出:“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以为一入政党,必须袒护本党,攻击异党,不顾国家大局”,“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

①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535页。

② 蒋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449页。

③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169、161页。

④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四周年训词》,《革命文献》第68辑(一),第62页。

⑤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

⑥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

⑦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8—291页。

⑨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5页。

造幸福为人民谋乐利”。<sup>①</sup>已执政的国民党,却依然局限于一党之私的狭小领域,也就难以实现三民主义从政党到中国的范式转变。

与国民党相比,革命时期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却表现出更加宏远的视野。根据近代中国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客观事实,共产党人既重视主义对本党的整合意义,认为党是主义的结合,通过整风运动、党校培训等方式加强党性教育,巩固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更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对不同政党及其主义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这种情况下,“‘收起’是不行的”,应该采取“比赛”的方式在竞争中树立自身的权威。针对各政党的信仰差异,共产党人“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sup>②</sup>根据各时期的不同主题,把共产主义理想具体化为各阶段的行动纲领和斗争目标,最大程度地反映各进步团体的共同诉求。例如:大革命时期,“打倒军阀”等主张深入人心,甚至国民党“三大政策”等概念也是由共产党人提出,令当时的胡汉民不得不感叹“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sup>③</sup>抗战时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主张,体现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成为维系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主张,又反映了民主建国的时代主题,各民主党派最终在中共“五一”口号的号召下走上了多党合作的政治道路。可见,中共在尚未执政的情况下,就已经具备了国家的视野,通过马克思主义政党化与国家化的交融完善,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源。

### (三)化大众与大众化

主义只有争得了民众,才能最终转为现实的变革力量。早在建党初期,孙中山就提出:每个党员都负有“感化”民众的责任,“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心理,到了全国人民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sup>④</sup>但孙中山并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到蒋介石时期,以儒学解读三民主义,结果致使儒学传统中的等级观念得以极大发挥:依据知识程度的不同,戴季陶把国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个大类,认为,中国人大多数属于“不知不觉”之类,这些人“六根不灵,知识不开”,当前只能“知识上得到革命觉悟的人,为大多数不能觉悟的人去革命”,具体来说就是“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在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依然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sup>⑤</sup>蒋介石也认为:“我们的革命主义,革命方略,一切难做的事,先知先觉的总理已经一件一件详详细细的研究明白告诉我们了”,已“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sup>⑥</sup>这样一来,知识精英成了中国社会的主宰,普通民众成了毫无能动性的盲从者。但事实上,在民众眼中,这些上流人士早已不是什么“先知先觉”,他们“智识既不足领导群众,而行为又在与自己发挥的理论相矛盾”,<sup>⑦</sup>已经失去了感化民众的能力和资格。

对此,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须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sup>⑧</sup>为启发民众觉悟,中共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推进马列著作的通俗化解读,涌现出艾思奇的《大众哲

① 《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3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7、706页。

③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395页。

④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284页。

⑤ 《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3年,第35—36页。

⑥ 蒋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369页。

⑦ 贺岳僧:《论改革运动失败之原因》,《独立评论》1936年第9期。

⑧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4页。

学》、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柳湜的《街头讲话》、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等大批通俗著作。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共在推动主义的大众化的同时,还在共产党人自身的大众化方面进行了可贵探索。早在建党之初,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已意识到:“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打消知识分子想成为学者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sup>①</sup>抗战时期,面对艰苦的农村环境,中共更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纳入到革命动力的范畴,认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sup>②</sup>号召党员干部及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甚至直接成为农民。这一做法,虽然经常被人视为民粹主义的表现,但如果从当时的现实环境以及之后的实践效果来看,正是因为毛泽东意识到单靠知识分子书斋式的理论解读和论争无法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才选择了工、农联盟的做法,最终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丰厚的力量源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源就在于完全结合了民众。

#### (四)旧秩序与新中国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义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对某政治秩序的破坏或者维护。蒋介石上任不久,国民党就取代了北洋政府获得了执政地位,并实现了中国的形式上统一。此时的蒋介石已着手巩固自身统治并逐渐置于首要位置,滋生出日趋明显的偏安、求稳的心理。1929年蒋介石在《革命与不革命》一文中,就已明确提出:“我们要求党治下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社会一切秩序的安定,等到在一定时期内,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全数删除了,中国社会稳定了,本党基础稳固了,然后我们便来实现三民主义最终的步骤,以求国民革命全部的完成。”<sup>③</sup>该情况下,一向以维护礼乐秩序著称的儒家思想,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维稳工具。针对外界对他的复古主义指责,蒋介石还辩称:“天下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从旧的东西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起来,根本就无所谓新旧,越是旧的东西越新”,<sup>④</sup>“一战”后德国和意大利之所以迅速跃居强国之列,而中国却迟迟不能复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般国民知礼与不知礼……在德、意两国,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sup>⑤</sup>这样一来,本以革命为本的三民主义,却在礼乐秩序的约束下,最终止步于旧中国旧社会的藩篱,丧失了继续前进的锐气。

侯外庐指出:“有正统思想的法度化和庸俗化,就会产生反抗正统思想的‘异端’。”<sup>⑥</sup>蒋介石政府对旧秩序的迷恋,更加激发了共产党人的革新意识。毛泽东认为,儒家礼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sup>⑦</sup>“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sup>⑧</sup>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变革探索,“这里有民主政治,这里有人民的安居乐业,这里有军民的一直热烈发展生产,不断出现劳动英雄,这里的人民与人民,政府职员与民众,军队与人民,大家都相亲相爱如一家人,这里在短短几年之间,便一扫过去在军阀官僚党棍特务统治下的荒凉与贫困,大家逐步走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sup>⑨</sup>根据地的成功建设实际上已代表了中

①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3—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③ 蒋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367页。

④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884页。

⑤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革命文献》第6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5页。

⑥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0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⑨ 陈伯达等:《评〈中国之命运〉》,华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第24、61页。

国发展的未来走向,成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出:自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已有了很大改进,“我们常常把眼前的许多进步事情当做家常便饭,其实比起从前来,乃是改朝换代似的变化”,这早已成为中国国情的一部分,“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sup>①</sup>

### 三、新时期“儒化共产党”思潮质疑

国民党关于三民主义儒学化的喧嚣,最终以国民政府的败退大陆而草草收场。但历史的教训似乎总要经历多次反复之后,才能引起世人的警觉。

近年来,国内又兴起了一股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儒化思潮。该思潮以蒋庆、康晓光、陈明、盛洪等人代表,通过创办刊物、开设学堂、建立网站、举办会议等形式,积极发言立说、广造声势,已产生了不小影响。他们认为:中国一直走的是“以夷变夏”的西化道路,“新民主主义同三民主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之后的改革开放仍然沿着这一文化歧路在走,“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造成了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sup>②</sup> 解决之道只能是,重塑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儒教成为“文化权利中心”,把中国建成“儒教国家”,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合法性的基础”,<sup>③</sup>“要复兴中国就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复兴儒家文化,复兴儒家文化的捷径莫过于把儒教确立为国教”。<sup>④</sup> 主要途径是: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其中,儒化共产党的办法是,党校教学增开四书五经、在公务员考试中增设儒学等等,最终把共产党改造成“儒士共同体”;儒化社会的办法是,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在民间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儒教协会等等。<sup>⑤</sup> 此外,还提出了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建立全球儒学传播体系等具体任务。

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儒学化相比,新时期的儒化思潮在表现形式、矛头指向等方面,都有了一些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二者却殊途同归、如出一辙。

首先,从该思潮的缘起来看,基本上是海外思潮的翻版,缺乏直接的实践根基。新时期的“儒学化”思潮与当年的三民主义儒学化一样,都主要不是由内部激发,而是直接源于外来思潮的喧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政治运动,已基本上堵塞了儒学在国内的发展空间,曾经热衷于儒学复兴的一些文化人士,也经过思想改造,纷纷表达了对新时代新中国的认同,例如,冯友兰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巨大成就都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底真理于中国社会,那就是,照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社会底规律,解决中国底问题”<sup>⑥</sup>的结果。该形势下,一直痴迷于儒学复兴的,主要是外国学者和少数移居海外的华人。他们从国外或者海外的某些情况出发,提出相应观点,形成思想潮流,然后又最终反哺到国内,也就是蒋庆所说的四个阶段即“守先待后”——“讲明正学”——“传播反哺”——“返乡复位”。<sup>⑦</sup> 长期侨居美国的杜维明也曾公开宣称:“儒学在21世纪是否有生命力,主要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77页。

② 蒋庆:《当代大儒的乌托邦实践》,《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7月21日。

③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3969429.html。

④ 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⑤ 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儒学中国》http://www.rujiazg.com/detail.asp?id=1178,2010-4-18。

⑥ 冯友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底奇绩》,《光明日报》1951年6月30日。

⑦ 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鹅湖》1989年第8期。

决于它是否能够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sup>①</sup> 这样几经辗转又最终传回国内的儒学,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明显的西学烙印。从这一点来说,国内儒学化思潮表面上是“中国”元素的复归、文化自信的提升,但其骨子里却有着明显的西方化色彩。一些国内学者往往把外来观点视为思想权威,当外人鼓吹西学,国内就力主西化;外人改奉儒学,国内也随即儒化,就连如何对待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也要仰外人鼻息、取决于海外思潮的取向,甚至已经到了不观“外”就不足以言“中”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自相矛盾并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已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②</sup> 目前看来,该警示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从思潮的内容来看,是对中国现实的进一步曲解,缺乏客观辩证的宏观视野。一般而言,在外来主义异域传播的初期,因为必然遭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抗拒,此时,新主义的传播者一般都会采取以“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之带上民族的特色,以减少传播阻力,例如,早期知识分子就曾用古代大同思想来解读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是,随着传播进程的深入,外来主义的中国化必然要进入实践层面,改为主要通过主义与实践的结合机制来推动主义的发展,此时的旧传统只有也随之融入现实实践之中,在实践运作中证明自己的指导价值,才能对该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产生实质影响。否则,脱离实践理性,仅人为地去美化传统,“极力地拉拢些好听的新名词硬加到他身上去,不管他能担负否,在他们以为这是给中国文化增加了些光彩与价值,岂不知这正是糟蹋了他”。<sup>③</sup> 事实上,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万能的,更不可能超越历史去解决一切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近代以来,无数的客观事实早已证明:儒学的复兴已不能拯救中国,更不可能发展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长期的实践磨合中为中国指明了富强民主的正确道路,并且,还在以现实的成效不断地丰富和优化着中华民族的内涵。正是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外来主义,它早已突破了传介初期作为“救国主义”的工具属性,变成了集工具和目的为一身的现实实体,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标识。不可否认,作为发展中的中国,目前肯定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客观问题,学术界可以各抒己见、献言献策,但绝不应该扭曲历史、否定现实,当前,只有立足客观、着眼未来,才能不断获得认识和实践水平的新飞跃。

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的观点时,曾指出:“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sup>④</sup> 任何形式上的模仿和重复,都将成为历史的笑料。国、共两党的成败历史,已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主义的力量既是微弱的又是无穷的,关键是看它有没有立足实践,找到现实的前进路径,企图以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方式来创造一个中国奇迹,必定又是一场毫无根据的空想。

责任编辑:田明孝

<sup>①</sup> 《杜维明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563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sup>③</sup> 杨明斋:《评中心文化观》,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53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3页。